



台 灣 新 文 學 史 論 叢 刊

7

台灣 的憂鬱

黎湘萍 ◎ 著

這本獨排眾議的

陳映真論

以「最後的烏托邦主義」概括其

寫作意義

以「台灣的憂鬱」論其詩意的敘述

以「異端」寫作界定其理性話語

並從中外文學「母題」與「間文性」

分析其文學遺產

從而形塑了陳映真荒蕪的曠野

和深沈的孤獨……

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 7

台灣的憂鬱

黎湘萍 著

人間出版社

台灣的憂鬱／黎湘萍著．-- 初版．-- 台北市
：人間，2003[民 92]
面；公分．-- (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7)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8660-83-9 (平裝)

1. 陳映真 - 作品評論 2. 陳映真 - 學術思想

848.6

92021604

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 7

台灣的憂鬱

著 者／黎湘萍

出 版 者／人間出版社

發 行 人／陳映真

社 長／陳映和

地 址／台北市潮州街九一之九號五樓

電 話／(02) 23222357

郵撥帳號／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印 刷／漢大印刷有限公司

電 話／(02) 29555284

總 經 銷／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 話／(02) 26418661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三六八五號

初版一刷／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定 價／三〇〇元

陳序

把一本討論我自己的作家論，在自己主持的小出版社出版，無論如何，總覺得靦腆。事實上，也正是這靦腆之感，使這本書在台灣以繁體字刊行的時間延緩了近乎十年。

而作者黎湘萍兄（以下禮稱略去）極懇切地希望我為這本書的台灣版作序，心中猶豫，遲遲無法下筆，就不難理解。直到初讀作者的台灣版序，受到了觸動，頗有感慨，終於找到一些想說、應說的話。

黎湘萍曾以「孤獨的義人」狀我。但聖經上多處反覆地說，世上「沒有義人，一個都沒有」。則我絕不是一個義人，而是一個多有缺點的、軟弱的凡人，是當然的事。然而說到「孤獨」，回想這半生，也確乎是行單影孤，彳亍著走來的。

在中國三〇年代文學，更不必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和文論體系是可以致人破身亡家的我的少年時代末期到青年時代初期，命運讓我在台北舊書店裡闖進了左翼文學和思想知識的嚴格禁區。我的思想和世界觀開始在飢渴的耽讀中發生根本性的大變化。但在反共法西斯的環境下，既使對骨肉兄弟和最親摯的朋友，都不敢透露我在知性和情感上的豹變。我開始感到同儕的來信或言談膚淺幼稚，我開始覺得人們話題中的書刊文章毫無意義可言。我開始避人耳目聽短波收音機，想像著遍地紅旗的祖國大陸，心神激動——但也在現實生活中日益感到孤獨、焦慮、恐懼和絕望。因為我知道，在反共戒嚴體制白茫茫的環境下，我永遠找不到同志，找不到組織，在全面恐怖清洗之

後，革命早已經破滅，毫無希望。

後來我想到，如果在三、四十年代，兩岸同樣讀過以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為開端，接受了左傾啟蒙的青年們，感受就會與我迥然不同。在那時，一旦他們向社會變革的理想張開了眼睛，他們也會同時看見平時看不見的幢幢奔波的人影，在奔向讀書小組，奔向進步和解放的道路。他們會感到孤獨的個人在民衆中得到了力氣；他們看見了希望，即便在法西斯統治下無數「暗暗的死」中，感受到的也絕不是絕望，而是悲忿的力量。但在六〇年代初的我，就不能不陷於至深的孤獨、焦慮、恐懼和絕望。

而這恐怕就是我早期所做的小說中，總是表現著熱切又欲言又止的理想，而不旋踵又陷入希望的幻滅，又終至於最後的死亡的所以吧。

六十年代中後期開展的「亞洲四龍」的資本主義化，不論在韓國、台灣、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在亞洲冷戰構造下極端反共意識形態統治下，以各種反共、國家安全法的獨裁體制，在外（美日）資和對美扈從政權推動的資本主義化，日本經濟學界稱之為「獨裁下的發展」。反共，國安體制壓抑了資本主義化過程中的社會和階級的矛盾，使外來和本地資本得以無忌憚地積累和集聚；而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對市場和積累過程帶來的矛盾與痛苦起到鎮靜止痛的效果。因此，在「四小龍」的思想界一般地受到以美國反共、自由主義的支配，對於各自依附的、畸型的發展及其所帶來的人與自然的被害，發不出批判的反省。

沒有料想到的是，中國人民一場偉大的革命，在同一時期逐步向極「左」傾斜並快速擴大化。解放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異化為國家宗教。雖然在整個中國革命歷程和文革時期的中國尖銳批判了帝國主義，號召了第三世界反帝獨立的團結，嘲諷的是中國因大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在獨立主權下，不曾經驗過戰後美國新殖民主義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統治；而從未完全資本化

的中國社會在革命後又性急地從新民主主義奔向共產主義的歷程，使廣泛人民、幹部和知識份子只能在口號和教條化的反資本論述和反帝論述——而不是從具體的生活里去「認識」積累和市場的殘酷性和新殖民主義的壓迫。加上極「左」運動在廣泛知識份子心靈留下的個別、具體的深重的爪痕，在八〇年代全面否定文革的共同的社會心理下，思想理論界、特別在九二年之後全面右傾化。反帝論、反資論和第三世界論在對「前三十年」的總的反動中幾被拋棄淨盡。

一九五〇年，在美國武裝守衛下，台灣在血泊中清洗了馬克思主義，迎來五十多年美式自由主義和市場意識形態的長期統治。台灣的思想、文化界於是被剝去了「左眼」，長年來習慣以「右眼」看世界，喪失了批判和反省的能力。而一九八〇年，作為「前二、三十年」的擴大化的極「左」傾向之反動，大陸知識和文化界的「左眼」，視力也迅速弱化。

而我的存在，自知只不過是兩岸五十年來社會與思想歷史錯位脫臼過程中偶然而唐突的產物。我的批判思維的資源，絕不源於我自己有什麼深邃的思想，而來自青年時代舊書店裡的不完整的禁書，後來又和韓國、日本、琉球和南非、菲律賓的進步知識界的思想與運動資源相接，也曾不甚認真地閱讀過一點英、日語進步思想和社科著作，不能掠為我個人的原創。此外，我在台灣經歷了怎麼也料不到大陸社會也要走大致上相同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和模式，而我對台灣發展歷程的省思竟而同時「適用」於大陸了。黎湘萍說我的話有「先知」和「預言」的性質和價值，完全是過高、過大的評價了。

然而，無可否認，兩岸社會的存在與思想的脫臼也使我在大陸知識界大致上也成了一個「孤獨」的存在。我經驗過個別的大陸知識份子直接、間接，委婉、直截，人前或人後，對我的「左派觀點」表示不可思議、不贊同甚至於嘲笑和憎惡。對於這樣的

感情，始則不無驚訝，繼而也很能理解了。以大幅轉向的大陸生產方式為基礎的上層建築——思想、意識形態的裂變，在今後的加劇，是意料中事。新自由主義論、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論的法制化論、反對對美國侵伊的批判、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人權」論，真是不一而足。今日主張對「前三十年」歷史的再思，重新評估「前三十年」「另類現代性」的朋友們前去的道路上的崎嶇，可以想見。

回顧走來的道路，明晰地感覺到，我在台灣的半生，無非都活在對「美國制霸下的世界秩序」（Pax Americana）的反撥中。隨著戰後兩極對峙的尖銳化，美國以強大的武力在全世界戰略要點佈置軍事基地，與各反共扈從國家訂立反共軍事「協防」條約，形成遏制社會主義社會的軍事條約網。美國並以經濟援助、合作的形式，變相輸出其獨佔資本，並增進受援國對它的政治與經濟依附。美國以留學體制、人員交換、獎學基金制度大量吸收各國精英知識份子，在美國國內或原社會中形成親美精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層，蔚為己用。美國或以駐在各國的新聞、文化中心推動「文化冷戰」，美化美式資本主義及其制度和價值，打擊社會主義。美國以情報或武裝干預，加深各國左右分裂、民族內戰，扶持極端親美、反共的軍事獨裁體制，屠殺和監禁各國各民族反美自主勢力，依仗其強大的武裝和政治、外交和經濟力量，塑造自己為龐大帝國。冷戰「結束」，蘇東社會一夕崩解，美國更無忌憚地宣傳自己成為超大帝國，踐踏既有國際性協作組織和條約，片面把赤貧、反美國家污名為「流氓國家」，主張恣意的「先制攻擊」，殺人國民，奪人資源，並強行推動為美國獨佔資本服務的「全球化」。

一九五〇年，這「美國制霸下的世界秩序」的形成期，正值我小學六年級的十三歲。不知不覺間，大半生生活在這大「秩序」中，成為幾代人的宿命。民族反目、分裂、對峙，極端化的

反共意識形態與高壓政治……多少人隨大「秩序」的潮流騰達，多少人在大「秩序」中「暗暗的死去」。擴大地想，毛主席堅信美帝國主義發動第三次世界戰爭之不可避免，在強敵嚴密封鎖下，對黨和陣營內部的革命的純潔高度敏感……從而招致「反右」和「文革」的極「左」化、擴大化，都未嘗不與這大秩序的「威暴」有一定的聯繫吧。

前不久，偶然讀到上海學者張耀寫的文章。文章引用了「世界體系論」的創始人伊·華侖斯坦對美國霸權的評價，說美國實際上是一個「沒有實權的超級大國、一個得不到尊重與服從的世界領袖，一個在它無法控制的全球亂局中隨波逐流的國家」。正是同一個華侖斯坦，在去年初在台灣的一場演講中，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未來做了悲觀的估計：世界自然生態將嚴重崩壞而波及生產；跨國資本在世界低工資地帶奪取剩餘的優勢有時而窮；國家政權保障和促進資本順利積累和集聚的功能即將萎縮，為平撫嚴重階級矛盾的「福利」政策成本陡增而使政策解體，一國內和國際間民族與階級的貧富差距空前分化。

華侖斯坦替世界體系算的流年竟只有今後的五十年。個別社會和國際社會的亂局是他對五十年的描寫。蘇東解體後沒有了有明確綱領、嚴密組織的「反體系」力量，但令人稱奇的是沒有統一意識形態的個人、組織、社會團體，卻以民衆的泛反全球化的團結形態，對強權的國際協商發出越來越激烈的批判與鬥爭。

而經歷了偉大革命的勝利與挫折的中國年輕的思想界，實在沒有理由不在自己民族從屈辱中崛起，又陷入新的苦惱的歷史中沈思，探索自己的發展社會學，探索面對問題的新的文學創作與評論的道路。

我謙卑、清醒地把黎湘萍這本書對我過高評價的部份當成他對我最真摯的友情、鞭策與勉勵的表現。讀到他的台灣版大序前不久，我有機會讀到賀照田、趙稀方兩位先生關於八〇年代摒棄

了「前三十年」後大陸文論的反思的文章，正好和黎湘萍的這篇新序聯系到一起，互為應求。我於是看見了大陸好學深思，富有知識原創力一代年輕學者的洞見和生命力。在我步入初老而大病倖癒的當下，看到了我曾為之憂惱的問題意識在祖國大陸清醒的知識份子中提起，半生快慰，莫過於此。

最後，我感謝黎湘萍慨允這本書在台出版，也感謝大陸三聯書局·哈佛燕京學術叢刊惠允授權出版，並從黎湘萍兄之囑，做序如上。

陳映真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廿四日

「走出國境內的異國」

——《臺灣的憂鬱》人間版自序

黎湘萍

藉著人間出版社惠允在台灣出版拙著《臺灣的憂鬱》之機，我重讀了一遍陳映真先生的著作，竟然產生了十分不安甚至悲觀的念頭。十年前我曾非常希望出版這本書，現在卻沒有這種急切的心情了，我倒想把它徹底修改一遍，或根據我對陳映真與台灣社會的新認識重新撰寫另外一部新書。記得這本小書出版後的第二年，即1996年，我曾向在北京舉行的「台灣文學研討會」提交一篇論文《被拋入歷史的人們——重讀陳映真、黃春明和王禎和的小說》（後發表於北京《台灣研究》1996年第二期），文中用「先知的困窘」來形容陳映真在當代的處境：

陳映真屬於那些需要時間來證明自己的洞見的作家。1959年他發表第一篇小說《麵攤》時，他並沒有表現出以小說為「預言」的能力，然而他卻隱晦地表現了台灣光復以來老百姓的困境。《麵攤》不只是一種善良願望的詩意表達，而且從一開始就表露出陳映真的政治情結，經歷過1947年2月28日屠殺事件的人們，也許會理解這篇小說的意旨：警察對窮人的艱難處境應該存有一種人道主義的體諒，而不是藉助體制的暴力來摧毀窮人的唯一求生的希望。1960年，當《我的弟弟康雄》出現時，陳映真開始探討理想和現實的難以調和的矛盾問題。他以日記的獨白

的方式，讓讀者介入了最終導致小知識份子的康雄自殺的精神苦悶，一方面，「貧窮本身是最大的罪惡……它使人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流於卑鄙齷齪……」，另一方面，「富裕」又「能毒殺許多細緻的人性」，無論貧富，都與罪惡有著難以擺脫的關係，這種兩難困境以及追求道德理想的純潔性與無法抵禦的物慾誘惑之間的靈肉矛盾，正是60年代初的康雄和80年代的蔡千惠（《山路》女主人公）走向死亡的原因。而這未嘗不是近代中國在長期積弱之後，在專制條件下從赤貧陡然走向依賴性的「現代化」道路的精神象徵。

陳映真以藝術家的敏銳和思想者的深刻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先知」和「啟示錄」的意義，從而使他被拋入了中國的當代史和文學史……。在率先觸及戰後的台灣人精神挫敗的《鄉村的教師》（1960）裏，他敘述一位曾經被日本人拉去當兵的青年吳錦翔，光復之後滿懷改革社會的熱望回到家鄉任教，然而曾經毀滅過知識與理想的「定命」的戰爭、爆破、死屍和強暴及精神的創傷（吃過人肉的經歷），在冷戰環境中對於改造中國這樣一個古老而懶散的國度的絕望，終於使之精神崩潰了。較早洞察了國際勢力影響下台灣的分裂意識的《加略人猶大的故事》（1961），借助《聖經》故事，塑造了在國土分裂狀態下精神苦悶的人物猶大，他游離於狹隘的奮銳黨人和博愛的耶穌之間，錯誤估計了「民眾」的力量，最後在無限的痛悔中自殺。深刻反省中國現代歷史罪惡之《文書》（1963）以及用悲憫博大的人道主義胸懷和階級觀點來描寫「省籍矛盾」的《將軍族》（1964）等作品，也表現了六十年代的陳映真以「市鎮小知識份子」身份面對歷史的方式，對他和他的人物來說，歷史是一種罪惡的力量和沈

重的包袱。國際性的意識形態冷戰把剛剛回歸祖國的台灣再次拖入了分裂的深淵，而這正是幾十年來台灣問題的癥結所在。

.....

陳映真、黃春明和王禎和都是受評率很高的當代「鄉土文學」作家，而且已經以他們作品的獨創性和思想性，審美性和批判性，為中國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深刻變化留下耐人尋味的豐富的藝術世界。雖然「鄉土文學」這個不確切的概念並不足以對他們作品的內涵進行全面的概括和評估，但是，作為一種具有「歷史」意義的文學話語，它仍舊可以喚起人們對六十～八十年代台灣文學的生動記憶。因此，對其作品的重新解讀，意味著對台灣文學史上那段重要歷史階段被稱為「鄉土文學」的「經典」作品的深入理解，……他們的作品所揭示的不僅僅是台灣的問題，而且也是正在走向「現代化」的大陸的、乃至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具有普遍的意義。對這些問題的揭示，正是以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等為代表的當代中國「鄉土文學」的重要功績，它們具有別的文學類型——例如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作品所無法取代的審美的和文化的價值。

與我寫於八十年代末的相關評論不同的是，九十年代以後，我是越來越強調陳映真寫作的「先知」色彩和「預言性」。這是因為中國大陸真正的社會轉型不是發生於七十年代末，而是九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只是宣告了文革的結束，之後將近十多年的時間，都屬於「摸著石頭過河」的嘗試「改革開放」的階段。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之後，大陸在對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不做爭論的狀況下務實地搞經濟建設，並突破原有理論框架而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知識份子開始出現分化

迹象，原來的「左」與「右」區分變得模糊，代之以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文精神」討論和更為深入的「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之爭。在這種政治、經濟和思想條件下，陳映真早在六十年代就開始思考、討論和表現的問題意識，對於大陸知識者而言，就不再只是「思想」或「知識」層面上的問題，而是必須面對的日益真切的、現實的、實踐中的問題。「先知」是陳映真不期然而獲的身份，「預言性」則是陳映真所有寫作最迷人的特色。正是陳映真的先知性格和他的寫作的預言性，引起了強烈的共鳴，甚至改變了我觀察當代社會的視野和方式。

作為一種批判性資源的台灣研究

回顧起來，《台灣的憂鬱》一書寫於1989年，1991年夏完稿，1994年才有機會得到劉世德先生的推薦，列入「三聯—哈佛學術叢書」出版。當時，我真的非常希望此書能引起讀書圈的注意，不是因為自己做了多麼了不起的工作，也不是為了吆喝賣書，而是覺得台灣問題太重要了，陳映真那些風格獨異、富於詩意和思想品質的小說以及他那一系列具有預見性與批判性的文化、文學、社會、政治批評也太值得大陸學界重視了。假如我的小書能多少引起那些高明的精英們對台灣問題的關注，我就心滿意足了——哪怕由於我本人學養的膚淺和見解的幼稚而引來激烈的批評，因為我深信，以我對台灣文學的粗淺的認識，對台灣社會的淺薄的瞭解，遠不足以讓我洞察陳映真小說的微言大義，也不足於讓我深刻認識到他所有寫作的價值。但假如人們能因此書而對台灣問題（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文學諸問題）感興趣，這本書也就達到了它的目的，因為發現台灣、認識台灣，也就是發現和認識大陸自己的歷史和未來——台灣不是「他者」，而是另一個「自我」。然而，我發現，我覺得重要的，高

明的精英們似乎都不以為然：1996年這本書曾因其議題的新穎被推薦參加一次評獎，卻因其研究物件的「小」而落選。當我被告知有評委認為此書談論的「只是」「台灣問題」而未能入選時，我為這理由感到無奈，也因此感覺到了做這一研究的寂寞。其實我並不想得到什麼獎項，因為我深知自己做得遠遠不夠。問題是：難道台灣文學及其相關的議題真的很「小」嗎？

從大陸大學教育體制設置的「學科」上看，「台灣文學」是被置於文學類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下，應該屬於三級學科，看來似乎是有點「小」。根據流行的學科偏見，治古典文學的等級最高，治現代文學者次之，治當代文學者又次之，治台灣、香港文學者複次之。這種荒唐的等級劃分，使得研究當代文學與台港文學的人似乎難於與研究古典、現代文學的人進行平等對話。因此，一般自以為有才華的人都不太願意進入這種「次等」的研究領域，生怕被人歧視。但據我所知，自甲午戰爭以來，談論台灣問題，不只是知識份子關注台灣的方式，更是他們觀察中國問題的重要的視野之一。台灣問題激發了公車上書，啟動了「戊戌維新」運動。光復初期，台灣問題的重新呈現，也是大陸知識者試圖在戰後重建自由、民主的中國社會的一種形式。在我看來，在學院或學術的範圍之內討論與台灣文學研究相關的學科建設之類的議題固然也必要，但更重要也更有意義的乃是台灣文學研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為當代中國知識界提供審美的批判性的資源。我研究台灣文學並不是為了填補體制內的「學科」空白，或與精英們做智力上的競賽，而是為了尋找這種審美的、批判性的「資源」。因此，我從1986年進入台灣文學研究領域後便甘心於這一領域，而在此之前，我對台灣問題幾乎一無所知。

那時候，我感興趣的是文學理論和英美文學。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流行的關鍵字是「改革開放」。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這兩項大的變革，需要有「實事求是」的

作風和「解放思想」的膽略，因此這個時期醞釀著的種種變革思潮，並不主要是個人的行為，而是得到官方支援的全社會的行為。文學理論的變革思潮是這個時期很重要的精神現象之一。為了擺脫長期以來被政治化的庸俗社會學、機械唯物論的影響，曾經被當作資產階級思想來批判的「無邊的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概念被重新詮釋，人道主義、人性論、精神分析學、人類文化學、語言哲學、結構主義、解構論、現象學、存在主義、荒誕派、象徵主義、超現實主義、未來主義、達達主義等各式各樣新的舊的西方學說，突然之間被重新發現，頗有「文藝復興」的勢頭。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人民文學出版社等重新出版或新譯的一系列世界名著名譯，包括文學作品、文學理論、史學、哲學（美學）、政治、經濟學等領域的經典作品，成為剛從文革的陰影裏走出來的學子們如饑似渴地爭相購買和閱讀的物件。而這一切是與文革期間只能閱讀馬克思主義一家的學說有著密切的關係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一向是欽定的教科書。人們厭惡的是幾十年來的教科書把原本很有活力的馬克思主義給教條化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已經不是被當作有生命力的理論，而是「權威」的理論，因此它長期以來只在兩個方面團團轉：一是詮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作家關於文藝問題的論述；二是把這些論述納入教科書「原理化」，體制化和教條化，並試圖把這些變成文藝政策，用於指導文學創作，結果導致文學寫作的模式化、僵化。在這種狀況下，上述各種西方學說和思潮的湧入和重新解讀，實際上是對僵化的「馬克思主義」的衝擊，儘管從一開始這些「西方思潮」的介紹和引進大部份都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並未脫離「批判借鑒」的軌道，但仍有人把這些借鑒和介紹看作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徵之一。

而這個時期對馬克思主義本身的閱讀也出現了新的氣象，人們擺脫了教科書條條框框的束縛，更側重於結合實際對經典原著

的解讀。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更是引起了閱讀和詮釋的熱潮。青年馬克思對「異化」問題的論述，不僅是思想界用於反省文革時期的反人道主義政治的武器，也是哲學界、美學界展開新一輪思想解放的基礎。「異化」理論與「人道主義」問題，曾經是這個時期很敏感的哲學和政治問題。但幾乎所有的討論都只能局限在「思想」的或「意識形態」的層面上，雖然這個層面的變革也會直接影響到政治實踐和經濟改革，但後者還只是相當謹慎地摸索著，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曾是大陸五十年代美學大爭論的主將之一的朱光潛、李澤厚等人的美學論著和譯著一時之間成為暢銷書，不是人們喜歡懷舊，也不僅是他們的「復出」具有象徵意義，讓人感覺到文革時期的消失和五十年代百家爭鳴風氣的復興，而是因為他們富有文采和激情的美學論述，一掃教條化「理論」的沈悶空氣，啟動了人們久已壓抑著的思想。朱光潛在翻譯柏拉圖、維柯、萊辛等人的著作之外，試圖重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述，其《西方美學史》拓展了人們觀察西方的美學史的眼界；李澤厚的美學論著融合了三種在當時相當激動人心的因素：青年馬克思異化理論、康德的主體性哲學和台港暨海外新儒家的思想。總之，在八十年代的大陸學界曾處於中心位置的文學理論、美學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人們思想與政治生活的風向標，文學理論與美學如何更新，如何吸納異域的思想資源以建立自己的新的論述體系，就不僅是所謂「學科」建設內部的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解放思想」的問題，這也是人們所以熱衷討論這類問題的主要原因。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的導師何西來、杜書瀛先生讓我去研究台灣的文學理論，因為五十年代以來，大陸學界對這一領域幾乎沒有什麼瞭解。

我開始在這一陌生領域踽踽獨行。在沒有任何研究成果可以作為參考的條件下，我泡在北京圖書館查閱自晚清以來的台灣資

料，除了閱讀相關的史料，例如清代以來的《台灣府誌》之類，還收集了有關詩話的著作以及晚明沈光文以來的各種文體寫作，作為必要的文學史知識的儲備。最後才把主要的關注點放在 1949 年以來的文學理論的發展上。1977 年的鄉土文學論戰激發了以陳映真、尉天驄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的活力，由他們開出一條在台灣來說算是「另類」的文論路線，這條文論路線所挖掘出來的問題意識，涉及到許多與現實世界密切相關的文學以及與社會、文化、政經問題，本來應該是我研究的重點，但因為大陸學界對現實主義文論比較熟悉，我當時的興趣並沒有放在這一派文論上，而更關注五十年代以來從「學院」裏發展出來的「純文學」理論。我試圖把「學院派」（王夢鷗、姚一葦、夏濟安、劉文潭、顏元叔、龔鵬程等）的「純文學」理論區分於官方的三民主義文論（如張道藩、李辰冬、王集叢的相關文論），從他們對「語言」的共同關注出發，虛擬了一個所謂的「語言美學」共同體，對這個共同體形成的歷史過程和內在邏輯做了初步的梳理。現在看來，由於資訊的缺乏和對彼岸狀況的不瞭解，我把學理背景相當不同，政治觀念頗為迥異，美學理念充滿差異的不同世代的學人的相關理論論述（theoretical discourses）強行揉和在一起，以論證一個有意無意間形成的「語言美學」共同體的存在，是相當勉強的。例如，王夢鷗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在李辰冬主編的《文化先鋒》（重慶）上發表過文章，並參與了張道藩關於「文藝政策」問題的討論。李辰冬除了他的「三民主義」文論，四十年代也曾出版過紅樓夢研究的論著。如果忽視了這些文論家在四十年代的大陸的學術活動，就無法準確描述他們的學術活動在「台灣」的延續和變異的形態。而僅從「政治」的視角或他們與「官方」人物的關係去斷定其文論的性格，顯然失之偏頗。然而，我之所以特別關注王夢鷗、姚一葦、夏濟安等先生的文論，是因為王夢鷗先生在七十年代最早提出了「文藝美學」這個概